

生产率异质性与境外产业园区扶持战略分析

——以湖南省企业“走出去”为例

李琳¹ 洪联英² 龚缘¹¹

(1.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2. 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8)

【摘要】从生产率异质性视角构建相关理论框架,以2000-2013年767起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进行经验分析表明:生产率异质性是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但中小企业生产率偏低制约了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企业的自选择机制和市场进入-退出效应以及“传带帮”模式,有利于扶持境外产业园区。提升生产率水平,发挥商会信息传递作用,建立高效的政府、产业园区和企业的三方沟通协调机制,是当前扶持境外产业园区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生产率异质性 中小企业走出去 境外产业园区

【中图分类号】F741;F4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9)01-0107-10

一、问题提出

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小企业“走出去”快速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去产能”“调结构”“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举措。然而,当前在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企业自身能力偏低,所有权优势缺乏,国际化经验不足;二是单个企业行为趋同,盲目投资和自相竞争,境外资产流失严重;三是政府的推动与企业的行动未形成合力,致使我国企业走出去处于“只见投资,不见产业”的“企业转移陷阱”中,无法形成中国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严重影响我国对外投资的稳步发展。

客观地看,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当前我国“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资本、品牌、专利、规模经济等方面既无所有权优势,在组织管理、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又不具备内部化优势。按照Dunning的观点,如果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或内部化优势,企业就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不能向海外扩张,因而我国无优势中小企业“走出去”开拓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6ZDA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琳(1995-),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

洪联英(1972-),女,湖南怀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产业经济等研究;

龚缘(1995-),女,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组织是联接单个企业行为和政府政策的纽带,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注重境外产业园区的组织联接作用,就有可能摆脱上述陷阱。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企业开始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境外园区,如2000年海尔集团建立美国工业园,2004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立的天津美国商贸工业园等。不过这些园区的作用和地位尚是概念性的,市场定位很不清晰,而且由于没有政府政策支持,园区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2005年底,商务部提出由政府扶持,给予2-3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持和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贷款,鼓励企业抱团到境外建设经贸合作区。迄今为止,商务部已经分两批共批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第一批于2006年11月底审批结束,共批准了8家;第二批于2007年底审批结束,共批准了11家;第三批合作区原本计划以高新技术工业园为主,但由于前两批在其建设和运营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目前一直没有招标批准^[1]。因此,中小企业如何依托境外产业园区来稳步发展,也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战略。

为此,从生产率异质性出发,构建中小企业“走出去”与扶持境外产业园区理论分析框架,以邵商为主体的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经验分析,不难发现通过扶持境外产业园区战略,可促成企业与企业合力,有效破解上述困境问题,并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新开放型经济、加快推进中小企业“走出去”稳步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中小企业“走出去”与扶持境外产业园区的理论框架

企业“走出去”本质上是对外投资企业的微观行为,企业主体条件是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根本,同时,企业“走出去”不仅要受国际市场和国际经营环境的影响和约束,也与母国的政策法律支持条件密切相关。依据这一逻辑起点,以Melitz^[2]、洪联英等^[3]生产率异质性方法为基础,可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这一框架的主要内容分三个层次:一是从微观企业主体条件出发,生产率差异是造成企业异质性的根源,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进入、退出条件和市场份额大小,从而决定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决策行为选择;二是从国际经营环境的影响出发,国际经营环境是影响企业的进入、退出国际市场和竞争程度的重要条件,从而影响企业是走出去投资还是国内生产的自我选择决策行为;三是从政府推动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出发,通过一些鼓励措施,如境外园区战略的构建,促成企业与企业合力,推进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稳步快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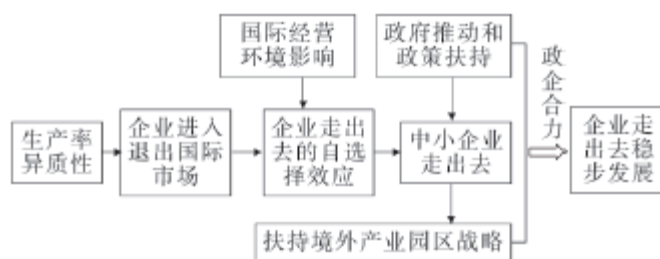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率异质性与扶持境外产业园区的分析框架

(一)生产率差异与国际市场的进入与退出

Melitz认为,企业在成立时间、规模大小、企业性质、员工构成、资本知识、品牌技术、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最终都将体现为企业的生产率差异^[2]。洪联英、邓翔、路征等认为,从内生因素来看,生产率的差异影响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以及总成本,也是造成企业间异质性的根源^[3-4]。对于走出去企业来说,企业生产率水平提升的时间和程度,以及进入出口市场的决定,也受贸易自由化时间、自由化速度等非技术因素所影响。特别是贸易自由化速度和企业对于贸易自由化的预期,可以从根本上影响出口状况和企业生产率间的因果连接^[5],而这些由外生冲击带来的总的生产率和进入贸易或贸易成本的作用,将会引导企业进入、退出国内和出口市场的选择,最终将会改变各国消费市场的构成^[6]。

生产率异质性会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进入、退出条件和市场份额大小。Melitz, Helpman等认为,由于出口、投资都存在一个单

位固定成本以及不可控的沉没成本,生产率差异成为影响企业进入、退出条件和分享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2][7]}。开放条件下,国际市场不仅与国内市场的进入成本存在差异,同时还面临着出口或投资的额外边际成本,因此,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也受零利润生产率ZCP的约束,而且通过国际贸易,ZCP将被提高,一些原存在于国内市场的企业可能被迫退出,国际市场份额慢慢向高生产率的企业靠近。新进企业受制于沉没成本,对未来利润的估算会影响选择,进入的约束条件为企业价值不能小于零,二者均衡确定行业中平均生产率,从而稳定市场中企业数量。

(二) 国际经营环境的影响与企业的自选择效应

Melitz & Ottaviano认为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出口与投资的增加会迫使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二是进口的竞争会加剧国内企业生产的竞争,使得行业企业的剩余需求价格弹性上移,这也会迫使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三是从市场份额来看,如果贸易成本相等,大国相对小国有更高的平均生产率和更多的产品品种,吸引更多的当地厂商;四是从经营环境来看,双边贸易自由化会加强双方竞争,进而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产品品种的增多以及价格的提升,而且贸易自由化也会引致企业先进入国际市场^[8]。

此外,生产率的异质性进一步影响企业出口、投资或国内生产的决策行为。由于企业在国际市场面临的沉没成本以及单位出口或投资的固定成本是不同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或者出口投资的决策,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于未来市场的期望以及企业自身条件。Helpman, Melitz & Yeaple认为,当生产率水平偏低、贸易成本也偏低时,企业才选择出口;而中等程度的贸易成本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可以选择混合一体化战略;只有当生产效率很高时,企业才会选择国外投资^[7]。在此基础上,Melitz将企业进入和退出对总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纳入考虑,更直接地将异质性企业作为总生产率变化的组成部分^[9]。Burststein & Melitz为强调企业动态与出口、投资选择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建立了一个企业内生动力与贸易自由化的模型,研究发现源自企业内生的变革是企业持久发展动力的源泉,而贸易自由化会促使非出口企业加大变革,因为他们期望未来从中获取高回报,而这些动态的影响都说明了长期贸易弹性要高于短期贸易弹性^[10]。

(三) 扶持境外产业园区与中小企业“走出去”

Helpman等人认为,世界经济变化的中心要素是企业的组织选择^[11]。由生产率的差异带来的目标市场与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重新分配,使大批中小企业限制于国内市场,或走入国际市场,却缺乏相应能力或经验导致困难重重。企业间组织恰好能将由生产率异质性所带来的市场份额重新分配,将无优势企业与政府、产业行为连接起来,在资源占用、交易关系、利益分配、行为关系、产业企业发展等多方面协调共享,促成无优势企业走出去。如图1所示,以扶持境外产业园区战略为例,政府作为这个国际生产组织的推动者和政策扶持者,促进园区企业间经营联系,包括正确引导和培训国内无优势企业跨出国门,给企业以融资、法律扶持,并积极疏通与东道国政府经济政治关系,辅助化解贸易摩擦,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等。行业协会或商会作为这个组织的协调组织者,是连接单个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纽带,有效地将企业需求、市场机制与政府的政策制度相衔接。企业作为产业园区的主导者和微观主体,在行业协会或商会的协调组织下,园区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互助合作网络,从事特定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实现国际价值增值。

换言之,政府通过扶持境外园区战略,使园区企业与东道国代理商、供应商以及其他合作伙伴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战略政策,构建起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组织机制,既充分发挥园区企业和行业商会的中心作用,促成企业与政府合力,又可引导企业理性选择对外投资方式、激励约束境外整合竞合行为、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推进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稳步快速发展。

三、经验分析:以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为例

(一) 方案设计与研究方法

选取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为例进行经验分析,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境外投资主体具有典型性,湖南省“走出去”企业总体上以国有、集体企业为主并向多元化主体延伸。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优化,湖南省境外投资的主体逐步实现了多元化,既有国有企业,也有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二是“走出去”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总体偏低,属于典型的无优势企业。如图2所示,2000-2013年期间,中小型民营企业一直占据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位置,尤其是在2009年民营企业投资数与国营企业投资数形成较大差距。2012年累计共核准境外企业682家(50家已撤销),其中由民营企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为546家,国有企业136家。2013年经商务部门核准的境外企业中民营企业的达142家,中方合同投资额8.59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84.5%和62.2%,其中大部分为省内中小民营企业。三是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具有代表性。近年来,湖南省实施“走出去”战略成绩显著,海外并购、绿地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等各项指标均呈大幅增长态势,尤其是境外直接投资突飞猛进,2008年实际对外投资达4.79亿美元,列全国第3位。2009年湖南省对外投资实际发生额达10.16亿美元,居全国首位。2012年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发生额达14.02亿美元,位列全国第7位、中西部第1位,对外投资额规模连续7年居中部省份第一。四是境外产业园区已经基本成型,但都不在国家商务部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之列,这样由无优势企业组建的境外产业园区,可以给其他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提供经验参照。商务部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仅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等三个省份,是以商务部和大型优势企业牵头进行。目前湖南省对外投资迅速发展,海外投资企业已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已有泰国、老挝湖南工业园和越南商贸物流园三个稳定的境外产业园区,且都已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其暴露的投资问题、企业组织障碍以及数据资料生成等方面,都能满足案例研究的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多案例嵌套方法。多案例研究可通过案例的复制来支持结论,提高研究的效度^[12],较好地分析无优势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组织障碍。在数据资料来源上,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通过走访湖南省发改委对外经济处、湖南省商务厅,以及对境内代表性主体企业进行咨询,获取所需数据和第一手资料;二是通过文献查询、各类统计年鉴及技术资料查询,获取所需证实或补充的数据资料;三是项目组长期从事本领域研究工作,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构建相应的数据库。由此,我们统计整理得出湖南省2000-2013年企业海外投资和境外产业园区的相关数据资料,样本案例从2000-2013年总共为767起,其中剔除掉8家投资方式不明的案例,以满足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资料搜集和数据采集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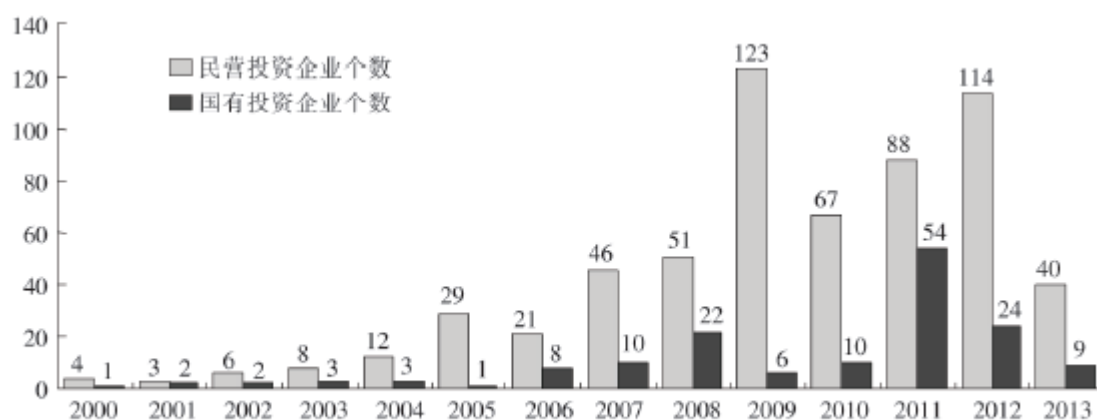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13年湖南省海外投资企业的性质比较

(二)企业“走出去”生产率水平的测度

对于生产率的测算,学术界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也称为技术进步率TFP进行测度。全要素生产率是对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效率,主要来源于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一般通过间接生产率的增长率来测算,称为索洛余值,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测量公式为:

$$GA=GY-\alpha GK-\beta GL$$

其中, $GY = dY/Y$, $GK = dK/K$, $GL = dL/L$, 分别代表产出、资本、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α 与 β 分别代表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索洛

认为,生产率的增長是产出增长与资本以及劳动加权增长之间的线性差额,这种差额由技术进步带来。该方法较为简便与直接,但实际估算中由于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技术中性等较强的约束条件,使得测量误差难以剔除^[13]。此外,Head等在继Griliches和Mairesse的基础上,使用了“近似全要素生产率”ATFP作为测算^[14]。测度公式为:

$$ATFP = \ln Q/L - S \ln K/L$$

公式表明,生产率测度始于平均劳动生产率 Q/L ,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密集度 K/L 。参数 S 表示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当生产率等于劳动生产率时, S 等于0;当生产率由资本生产率 Q/K 给出时, S 等于1。一般情况下的研究把 S 设置为1/3。

如表1所示,由于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我们假定投入到生产中的要素为单一劳动,即 $S=0$,生产率为单位劳动产出 $LTFP = \ln Q/L$,并选取了湖南省在东南亚地区几个主要行业的投资在200万以上的10家具有代表性中小企业,作生产率分析并按降序排列。这10家企业均为民营性质,主要为工业企业,且 $LTFP$ 值区间为1.2-4.39,依据李春顶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1个行业类别的生产率均值的测算^[15],外向型制造业企业的 $LTFP$ 值在3-6之间,并以4-5区间取值最多,而200万以上投资规模的湖南省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生产率远低于这个值域。可见湖南省大部分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生产率水平偏低。

表1 2013年湖南东南亚境外产业园区的典型企业生产率测度以及行业分布

境外企业名	投资国	行业	中方投资 (万美元)	$\ln Q/L$
中泰德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泰国	矿产资源开发	514.5	4.39
越南隆安大通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越南	轻工产品制造	200	3.05
老挝波乔嘉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老挝	农、林、牧、渔业	2000	2.93
越中水泥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越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00	2.71
中泰盘古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泰国	机械设备制造业	280	2.59
越南义安越海矿冶有限公司	越南	矿产品加工	200	2.59
老挝哥弟实业有限公司	老挝	贸易	200	2.46
越南华越贸易实业有限公司	越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0	2.41
老挝 LG 工业有限公司	老挝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400	2.30
老挝 PSIA 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老挝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200	1.20

资料来源:依据湖南省商务厅、咨讯行的数据整理。

(三)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生产率效应分析

湖南省境外园区建设工作已开展四年多,2010年和2012年在东南亚地区的泰国、老挝、越南先后建立了三个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型的境外园区,目前三个园区的运营发展情况良好,为湖南省企业“走出去”搭建了新的贸易投资平台。

其一,泰国湖南工业园位于巴真武里府,由湖南邵东隆源公司牵头,泰国湖南商会与泰国甲民武里工业城合作开发,项目分两期:第一期开发1平方公里,土地已完成平整,水电、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已具备,园区内已经签订12家企业,主要涵盖化工和汽车配件两大类,运营状况良好,目前正在筹划第二期的建设。

其二,老挝湖南工业园位于万象,是由老挝政府牵头,在湖南省政府支持下以老挝湖南商会为平台而搭建的免税工业园,截止至2012年6月已有7家企业签订了入湖南老挝工业园协议,其中包括1家日本企业,此外老挝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及海关部门已进驻园区办公。

其三,越南湖南商贸物流园是由谅山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人民政府、越南谅山一同登口岸经济区、越南(祥瑞宝庆)实业公司、越南中国商会湖南企业联合会于2011年11月共同设立,分两期进行:一期建设为工业区建设、生活配套及物流加工系统;二期建设为商贸加工区建设、完善商业配套及加工开发。三个园区的总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 湖南省已建成的三大境外产业园概况

名称类别	泰国湖南工业园	老挝湖南工业园	越南(东盟)湖南商贸物流园
成立时间	2010 年 1 月	2010 年 9 月	2011 年 11 月
区位	巴真武里府	万象嫩通经济区	谅山一同登口岸经济区
占地规模	67 公顷	110 公顷	126 公顷
投资规模	16100 万美元	6000 万美元	7000 万美元
功能定位	综合性园区	综合性免税工业园	商贸物流平台
建成方式	企业主导,政府推动	企业主导	政府合同作搭建
主要行业	化工、汽车配件、轻工机械、摩托车、空调、手机、家用电器、五金工具、日用百货、农产品加工(木	商贸物流、纺织服装、农用机械、汽车	建材冶金、农产品加工
牵头企业	湖南邵东隆源公司	邵东县金海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零配件、工业建材、食品加工 邵阳市祥瑞商贸中心

资料来源:依据湖南省商务厅、咨讯行的数据整理。

在此基础上,依据前文对2013年湖南省东南亚境外产业园区的典型企业生产率测度及其行业分布情况,认为目前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的生产率特征及其效应如下:

1. 呈现出生产率水平偏低和典型的无优势企业特征

由于湖南省在东南亚投资的企业性质与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关联性,三个境外产业园的运营主体呈现出典型的无优势企业特征,表现在投资企业以小规模民营企业见多,产业多为轻工制造业。据 2007-2013 年湖南商务厅湘企国外投资统计数据,从企业规模来看,湖南企业在泰国、老挝、越南投资的所有的 242 家企业中,投资在 101 万美元到 200 万美元的企业和 100 万美元及以下的企业的数量较多,分别占据 48%与 40%的份额,而 1 0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为 8 家,仅占比 3.31%,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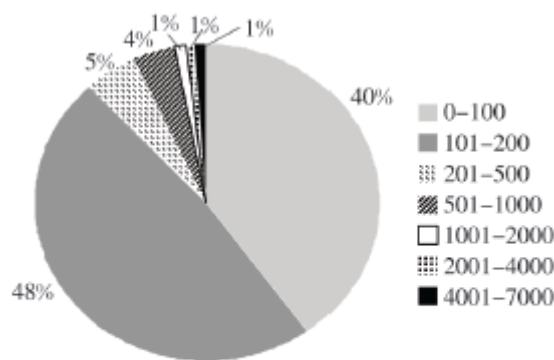


图3 湖南省在泰国、老挝、缅甸的企业投资额(单位:万美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如图4所示,贸易(主要为箱包纺织、摩托汽配、家电五金等)占据30%的份额;其次是农副产品加工11%、矿产品加工与开发10%;其余行业也主要是轻工业等传统加工领域。



图4 湖南省在泰国、老挝、缅甸的投资行业分布

具体以泰国湖南工业园为例,首先从投资规模上看,截止到2013年7月为止,在泰国投资的44家已经注册批准的湖南省企业中,总投资高于250万美元的仅有4家(1000万美金以上的仅有两家),有33家企业的总投资额仅为100到120万美元左右;从企业性质上来看,仅有“金健米业”一家为国有企业,其余均为民营企业,是“走出去”的主力军。

和泰国的情况类似,在老挝的中国企业基本为小型民营企业,规模不大,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方投资的最大规模只有560亿美元。2013年为止,仅一家国营企业在老挝投资,高于200万美元的仅有12家企业,上百家企业在老挝的投资规模只在100到200万美元之间;在万象投资的湖南省企业中,仅有一家矿产开采企业达到了8000万美元的投资。这些事实表明: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从境外企业资产规模、行业分布、企业性质、企业营业收入和企业利润指标来看,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企业总体上规模偏小、实力较弱,生产率总体水平较低,即呈现出典型的无优势企业特征。这说明,如果这些园区企业仍然选择走单个无优势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和战略,境外产业园区难以凸显中国行业特色,且民营企业规模小,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设计以及技术上的提升空间有一定局限,无法培育出真正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境外产业园区。实际上,在东盟发展的湖南省企业大都是私营业主或中小企业,资金融通处在弱势,抵押贷款、担保等各方面都不及大型企业,多数“走出去”依靠资金主要是靠有限的原始积累,而这些都限制了企业做大做强,同时针对于园区建设的专项资金补助措施的缺乏,也制约了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2. 呈现明显的企业自选择机制和市场进入-退出效应

与我国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府引导机制不同,东南亚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具有自发集聚的产业特点,即“走出去”的民营中小企业主体,具有极强的自主能动性。这些中小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不盲从由政府引领的绿地投资模式,而是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率异质性水平和条件,在市场化环境之中的自主投资行为,企业对于建立境外产业园区也完全是自选择的结果(这三家境外产业园区目前都不是商务部资助的两批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园区)。在样本数据中,从2000-2013年湖南省企业海外投资案例共有676起(不包括追加投资案例),其中“已撤销”和“暂停经营”共80起,其中独资方式的企业占39起,合资方式的企业占41起,未涉及到并购案例。“已撤销”案例的出现是从2009年开始,主要集中在2011年和2012年。在“已撤销”和“暂停经营”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主体,共为65起,达到81.25%,而国有企业仅为15起。国有企业的15起中,主要为中联重科对服务业的独资被撤销,而民营企业中的三一重工集团则主要是贸易的独资被撤销。

事实表明,这些园区企业经过多年的国外投资经营,国际市场的进入-退出效应明显,体现了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的市场化功能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园区企业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发展活力,为扶持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条件。实际上,在东南亚市场,泰国、老挝、越南等都是WTO成员国,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辐射整个东盟,具备良好的外资经济环境,同时与湖南省“走出去”企业部分产业结构良性互补,特别是以轻工业制品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因而具备大潜力的消费市场,积极承接了湖南省产业的国际转移,有利于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

3. 行业商会的组织连结作用凸显

我国境外投资经营过程中,行业商会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对于我国具有灵活性的中小企业来说,我国的行业商会并未得到企业的真正重视,过于依赖政府,行业商会在中国对外投资上,并没有完全发挥其职能。但在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中,商会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连结协调作用,这是湖南省境外投资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依据湖南省商务厅的统计资料,早在建立境外工业园之前,以邵商为代表的“下南洋”商人就开始在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经商,其商贸产品畅销东南亚国家,实力不断壮大,形成了以商会为连结纽带的自我选择产业集聚模式。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老挝2.5亿元的年摩托车销售额中,2亿元是湖南邵阳人实现的;湖南人还包揽了老挝手机市场份额的60%,服装和箱包市场的50%。2012年湖南省在泰国注册的企业有500多家,泰国日用品批发、零售商的货源80%来自湖南省。

2008年10月,在省商务厅的指导下,以及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和老挝中国商会的支持下,在老挝的邵东企业发起并成立了湖南省首个境外商会——老挝湖南商会,2009年10月,在泰国的邵商又发起成立了泰国湖南商会。境外商会的成立,在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服务、解决对外投资合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增强境外湖南省企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商会的人脉、资金等优势促进了产业园区的发展,商会会长率领商会成员参加由中国侨联和各省市侨务部门组织的活动,以及世界华商大会,为配合企业未来“走出去”提供人脉资源,促使企业少走弯路,稳定发展,充分发挥了信息传递机制和组织连结的重要纽带角色。

实际上,这种以无优势企业抱团形成的境外园区组织特点,是理解湖南省特有的以邵商为主体境外园区充满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与犹太商人的合作机制类似,湖南邵商特有的家族式“传带帮”模式,以家族、同乡为纽带建立起极强的信誉机制,从而构成了特定的企业间网络组织,这个组织牢固,形成组织内部资源的专用性,以及进入成员的自我激励模式,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其他企业或组织很难融入其中。正因如此,境外产业园组织内部具有极强的学习效应,生产成本与商务成本更具竞争力,经营风险更低,从而使得中小企业走出去更具有发展活力。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生产率异质性视角,构建一个中小企业“走出去”与扶持境外产业园区理论框架,可知生产率差异造成企业的异质性,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国际市场条件,而国际经营环境影响企业出口、投资或国内生产的自选择决策行为;由于中小企业

生产率水平普遍偏低,以抱团方式构建境外产业园区,并通过组织的联接和协调机制,能有效推进中小企业“走出去”稳步快速发展。整理湖南省2000-2013年境外产业园区的数据资料,并以767起邵商为主体的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1)从境外企业资产规模、行业分布、企业性质、企业营业收入和企业利润等指标来看,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企业总体上都呈现出生产率水平偏低和典型无优势企业特征,规模偏小、实力较弱,限制了企业做大做强,制约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2)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呈现出明显的企业自选择机制和市场进入-退出效应。与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府引导机制不同,湖南省企业“走出去”的主体多为民营中小企业,具有自发集聚的产业特点和极强的能动性,不盲从、不跟风由政府引领的绿地投资模式,而是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率异质性水平和条件,自主选择进入-退出国际市场,自发抱团建立境外产业园区,为扶持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微观主体条件。(3)商会和以家族、同乡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传带帮”模式,在湖南省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连结和信息传递机制作用。湖南邵商特有的以家族、同乡为纽带的建立起来的“传带帮”模式,具有极强的信誉机制,而且行业商会在为境外企业提供信息服务、解决对外投资合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增强邵商的凝聚力、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激发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活力的非常重要因素。

上述结论表明,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普遍存在生产率水平偏低,单个企业做大做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迫切需要依托行业商会和园区平台的联接和支持;而通过扶持境外产业园区战略,充分发挥园区平台的信誉机制和行业商会的联接协调机制,立足当地市场,确保企业“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市场活力,是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新的战略模式选择。为此,合理可行的战略对策建议如下:

(1)着力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水平。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企业国际化的经验,要引导企业以品牌、技术、专利和管理为核心,进行实实在在的积累,打造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用企业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在国外建立起稳定的可信赖的形象,脚踏实地将中国品牌在当地积累起来,这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向国际的前提。

(2)合理调整产业定位,促进境外产业园特色化和专业化发展。目前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普遍存在定位过高,产业选择过杂的现象,不符合我国的企业条件,也不符合区域经济地理要求和东道国的国情,需要进行产业定位调整。为此,要从产业经济角度,合理评估产业园区的主导产业,找准园区的竞争优势,对园区的交通、资源、供应链、产业特色、市场覆盖率、获得利益点等方面加以分析和把握;同时要引导企业充分考虑东道国国情需要,结合企业的技术、管理、人才优势和国际商务经验,以及拥有的国内潜在招商资源,对境外产业园区未来的产业方向和商务功能做出明确、具体的定位。此外,集聚具有来源地的地缘优势以及市场基础好的企业,形成潜在产业园区,积极引导和培育有特色的专业化园区。

(3)政府与商会积极引导和培育园区内发展潜力大、带动效应强的企业,集中其优势资源发挥作用,积极培育园区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在遵循东道国市场的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管理制度调整,设立合理准入门槛(包括投资标准、行业领域等等),清理整顿,企业要精而不要多和杂,尽量促使园区内的企业向专业化、优质化、高效化迈进,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促成产业集聚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帮助企业积极制定自身的战略产品计划,引导企业以质取胜,同时积极引进科技含量高的国内外企业入园,引导境外园区经济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

(4)充分发挥行业商会的组织连结和信息传递机制作用。在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中,行业商会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组织。然而,目前我国行业商会并未得到企业的真正重视,以至于过于依赖政府。特别是行业商会在连接企业、政府以及市场方面的号召力弱,没有建立境外资源信息系统,对于境外投资的资源潜质和投资环境缺乏本质的了解,矿业公司和石油集团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竞标,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单一。因此,要完善行会、商会自身的职能建设,由行业商会与民营资本构建社会生产网络,充分发挥商会和以家族、同乡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传带帮”模式,这是发挥行业商会的组织连结和信息传递机制作用的有效举措。

(5)建立高效的政府、产业园区和企业的三方沟通协调机制。构建政府、园区和企业之间交流机制,做到“有政策必传达、有政策必落实、有问题必反馈”的三方沟通协调机制,数据上报与政策传达保持通畅、及时和高效,积极进行企业间经济、信息、法律、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加强相互沟通与协作,避免短期行为,杜绝恶性竞争。政府应根据国内产业发展规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国

民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区域布局的总体目标,协调政府、园区和驻区企业的关系,紧密联系东道国现实情况,防止浪费资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指导,防止不必要的损失,推动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健康、快速、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洪联英,刘解龙.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而不强[J].财贸经济,2011(10):95-103.
- [2]Melitz,Marc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Econometrica,2003(71):1695-1725.
- [3]洪联英,唐寅,彭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障碍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2(9):72-81.
- [4]邓翔,路征.“新新贸易理论”的思想脉络及其发展[J].财经科学,2010(2):41-48.
- [5]Costantini J,Melitz M.The Dynamics of Firm-level Adjustmen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M]. In:Helpman, E,Marin,D,Verdier,T eds.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a Global Econom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141.
- [6]Ghironi F,Melitz M J.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Dynamic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865-915.
- [7] Helpman,Elhanan,Marc J.Melitz and Stephen R.Yeaple,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 [8]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Market size,Trade,andProductivity[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8(1):295-316.
- [9]Melitz M J,Polanec S.Dynamic Olley-Pakes Productivity Decomposition with Entry and Exit[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15(2):362-375.
- [10]Burststein A,Melitz M J.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Dynamics[J].NBER Working Paper,2011.No:16960.
- [11]Helpman,Elhanan.Trade,FDI,and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6(3):589-630.
- [12]Eisenhardt K M.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4):532-550.
- [13]洪联英,陈思,韩峰.海外并购、组织控制与对外投资方式选择: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10):40-53.
- [14]Head K,Ries J.Heterogeneity and The FDI Versus Export Decision of Japanese Manufacturers[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3(4):448-467.
- [15]李春顶.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检验[J].世界经济,2010(7):64-81.